

# **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 教学参考资料选编**

## **第六集**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编**

**企业管理出版社**

**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

**教学参考资料选编**

**第六集**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编**

**(内部发行)**

**\***

**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80,000 字

1980 年 8 月第 1 版 1980 年 8 月石家庄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4207·011 定价 0.75 元

# 目 录

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房维中	(1)
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薛暮桥	(8)
关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意见	马 洪	(28)
关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	桂世镛	(49)
谈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苏 星	(81)
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庞永洁	(95)
关于生产力布局问题	薛葆鼎	(112)
试论我国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问题	张思奇	(128)
关于能源方面的几个问题	张彦宁	(153)
企业计划管理的几个新问题	徐 祂	(169)
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	王庆成	(188)
关于日本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和中小企业情况的考察报告	国家经委访日代表团	(212)
附件一：日本专卖公社统一管理烟草		
供产销的情况		(232)
附件二：大阪中小企业投资育成会社的情况		(236)
附件三：大阪中小工业团地的情况		(240)
附件四：东京的一个电镀废液处理中心		(242)
附件五：高度专业化协作的日本开闭器工业公司		(244)
附件六：大量开发新技术的甲巴格斯公司		(247)

# 当前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房维中

经济工作全国人民都很关心，国外也很关心。除了政治上能不能安定团结之外，大家担心的是经济工作能不能搞好，既怕慢，又怕乱，怕折腾。最好搞快一点，慢了不解渴，但又怕折腾，怕不稳当，怕走弯路；走了弯路再来收拾，反而更慢了。目前理论界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在探讨，怎么搞得快一些，而且不出大的问题。现在各方面都在进行改革，我就这个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一) 我们的经济要搞活，不要搞死，改革是必要的。**  
长期以来，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过死，缺乏活力。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甚至连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要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带来很多问题。什么都想包下来，包死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商业上，原来很多城市有夫妻店，半夜十二点也能买到东西，结果把这些都取消了，而国营商店上午九点钟开门，晚上七点钟关门，过了这个钟点别想买到东西，对人民生活很不方便。这并不是说全民所有制不好，在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下，急于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实行单一的经济成分，可能不行。再一个例子就是急于搞产品交换。既然都是全民

所有制，就要搞产品交换，取消生产资料的商品，结果也把经济搞死了。不搞商品交换，什么都由国家调拨，反正不和用户见面，生产出来的东西都直接交给物资部门或商业部门，质量好不好，有无竞争性，我都可以不管。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就是竞争，企业极其关心产品的命运。产品是否合乎市场需要，能否销售出去，决定它能否获得利润。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但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竞争又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性。我们是公有制，应当而且可以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利用商品交换，利用竞争，促进社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是，基本建设上搞实报实销，财政上搞统收统支，用多少钱向国家要，花多少钱向国家报销，企业不负经济责任，因此企业不注意缩短建设周期，不注意投资效果，不注意增收节支，这就把事情搞死了。再就是生产好坏同个人的经济利益不挂钩，企业没有主动权，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计划管得太多太死，行政层次和中间环节太多，关卡林立，把经济管死了。长期以来我们闭关自守，只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打圈子，这也搞死了。本来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国家，为什么要把大门关起来，不同外国发展经济技术交流呢？这些都需要改。改革的大方向要肯定，不然就只好一潭死水。

（二）要避免折腾，避免走弯路。我们过去发生过大的曲折，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坏人捣乱之外，可否作这样的分析，在形势好和思想比较解放的情况下，容易头脑发热，对问题处理不当，因此也就容易发生折腾。形势一好就想大干，高指标一来，就折腾。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大折腾就是如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结果把规章制度都烧掉了，

甚至把技术资料都烧掉了，把成熟的经验都破坏了，什么都要大办，都要化，造成了大的折腾。所以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是提倡解放思想的时候，越要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解放思想的同时，提出要实事求是，这是很重要的。解放思想，要破除一些东西，要打破常规，但不是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要了。有些准则，有些规律，有些基本原则，是不能违反的。现在咱们的国家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决不能再折腾了。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经济困难很多，无论如何要搞得稳当一点。李先念同志最近讲：“中央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保证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去争取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这条指导原则各方面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我们应当努力遵照中央的要求去做。

（三）思想上要解放，行动上要慎重。思想上不解放就改革不了，但又要避免折腾，因而行动上一定要慎重。大的改革，一定要经过试点，要先立后破。过去很多改革吃了亏，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试点就推开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没有搞试点，一个公社挂起了牌子，全国一号召，就都挂起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没有一套具体章程，什么叫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怎么搞法，都还闹不清，反正挂起牌子再说。结果搞起了人民公社，体制一变再变，最后还是落到队为基础。还有些工作，只搞了几天或几个月的试点，情况并没有搞清楚，就推广开了。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再推广；这是毛泽东同志多次倡导的。我们有许多事情由于没有这样做，走了弯路。现在我们搞扩大企业自主权，搞市场调节，搞扩大地方权力，这是必要的，但鉴于过去的经验，

也必须进行试点，取得完整的经验，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推开。对于整个体制改革，更应该如此。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个企业，应当更加慎重。搞得不好，发生了问题，再来纠正，时间耽误了，而且会造成大家对改革信心不足，结果不利于改革。我们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少年不动，一动就想马上推开，急于求成。一九八〇年国家经委派人到匈牙利作了些调查，匈牙利搞体制改革，准备了几年的时间。这个国家才一千多万人口，和我们烟台地区的人口差不多，企业也不多，但还是准备了几年，并不马上实行，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训练干部，再在全国推开，现在我们搞体制改革，不能急急忙忙地动手，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不预计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先改起来再说，就非出纰漏不可。我们有许多事情还是“先破后立”，干起来再说，这种办法至少对于经济工作是不行的。滥发奖金，滥提物价一个原因是一些单位、一些人不执行财经纪律。但是缺少一个完整的办法和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到底怎么发奖金，价格如何搞法，应当拿出一个办法来，大家去执行，违反就制裁。现在许多事情没有这样做，没有个章程又要搞，当然要乱了，而且乱了还无法制裁，打屁股都不知道往谁身上打。慢慢吞吞是个坏事，慢了不行，但搞急了也会坏事情。所以我们既不能保守，要解放思想，要进行改革，又要避免折腾，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坚决实行先试点，取得完整的经验，订出章程以后，再普遍推开。就象华国锋同志指示的那样，决心要大，步子要稳，首先要试点。在搞试点的问题上，决心一定要大，就是试坏了，也可以取得反面的经验。有了完整的经验，有了章法，然后再推开，就可以避免折腾。不试

点就推开，出了问题再来收拾，肯定发生折腾。

近来我们同外国人谈生意，外国人很担心，说中国很多事情没有立法。我们确实立法太少。现在很多事情还是停留在一般号召和一般原则上，没有具体办法。提出一个原则，中央讲，省里讲，企业也讲，一直讲到底下；下边给上边写报告，从企业讲到省里，讲到中央，讲来讲去还是那个原则。比如质量第一，谁也不反对，部里也讲，企业也讲，到底有什么具体办法？应当立法。当然立法也要试点，总结经验，逐步完善。

(四) 计划工作需要改善，需要完善，但要坚持搞好，不能不要计划。不讲价值规律、不进行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行，但不讲计划规律更不行。不讲计划，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到中国考察，很多就是考察中国怎么搞计划的。因为它头痛的问题，就是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搞长期预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我们由于过去计划管得太多、太死，因此现在要强调灵活性。多讲点灵活性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把我们的法宝、我们的计划经济给丢掉了。如果不要计划经济，完全按价值规律去生产，不是走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吗？而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恰恰感到不行了。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密切联系的，如果不从全局出发，过细考虑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而是单独一件事一件事、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搞，就会导致比例关系的破坏。因此，一定要强调综合平衡这件事。所谓计划性，就是要综合平衡。经济工作中发生的许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周密的综合平衡。特别是在调整时期，每个单位都

有自己的理由要求增加投资，增加建设项目，增加财政开支，讲得都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领导一听认为应当支持，但进行一下综合平衡，一算总帐，就办不了和不能办了；如果硬要办，就会出现财政赤字，出现物资的不平衡。国家计委常常碰到这种情况，订计划时，不把项目排上，大家埋怨；列上计划以后，东西拿不到手，回过头又要挨骂。因此得出一条经验，挨两次埋怨不如挨一次埋怨，订计划时有把握就上，没有把握就不上，埋怨就埋怨这一次，事后就可能不埋怨了。

在计划工作中，我们想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强调实事求是。应该办的，能够办的，一定要努力去办。实在办不到的事，要敢于说办不到。在计划工作中不能搞高指标，不能搞形式主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五) 一定要抓好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过去由于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长远规划，有些项目往往是今年上去了，明年又下来了。没有一个富于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长远规划，走一步看一步，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并容易出现折腾。中央已经决定，从现在开始要制订长远规划。各省市、部门都要组织一定的力量，由主要领导挂帅，着手制订长远规划，并确定召开长远规划座谈会，系统总结我们经济建设的经验，分析我们当前的经济状况，研究和确定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先搞个纲要，经国务院讨论和党的十二大通过以后，再发动企业、社队自下而上地制订自己的十年规划。十年规划搞好了，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更主动了。

十年规划中，要强调几件事情：

首先应当把基础搞得扎实一点，这个基础包括农业、燃

料动力和原材料、交通运输以及企业管理上轨道、人材的培养、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基础工作，我们都应搞好。特别是能源问题和人材培养问题，没有十年周期就见不了大的效果。十年规划，应着眼于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抓紧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如果现在不抓能源勘查和开发，不抓人材培养，十年以后还是接续不上。如果现在不下大力量进行企业的整顿，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过几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会遇到阻碍。我们不仅要考虑当前十年的速度，还要考虑后十年的发展速度，给后十年打下一个基础。

其次，我们要讲求经济效果，讲求工作效率。不能什么事情都搞包干制、供给制，不能不计成本，不计盈亏，不算经济账。今后要把经济效果、经济效率作为考核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三，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和贷款，一定要强调国内的偿付能力、消化能力和配套能力。能偿付、消化和配套就进口，否则就不要进口。

要努力使我们这次制订的十年规划既富有远见，又扎实。我们的经济工作要做到使全国人民放心，也要使国际上放心。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制订好十年规划，需要统计部门密切配合，也需要理论部门的同志配合。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在理论上就摇摆。想要不折腾，首先在理论上就不能折腾。我们需要理论部门的密切配合，来解决我们国民经济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 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薛暮桥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三十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着手进行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当然，这些工作是艰巨的，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在工作中不断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方案，进行分析比较，以供中央选择。下面，我根据中央提出的指导思想，讲几点个人的体会。

## 一、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经营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是不断发展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学说：“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还不能不保留一些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在这本书里马克思阐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他认为

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所以设想的是全社会公有制。这样的社会，已经没有商品交换，货币可以变为劳动券。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不应当要求他们把社会主义的细节统统揭示出来。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会长期存在。斯大林领导完成了个体农业的集体化，他在一九三六年关于宪法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还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是否存在商品，在苏联是有争论的。斯大林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指出，只要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次新发展。但在两种所有制合并为一种所有制，即全社会公有制以后还有没有商品交换，他没有讲，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可能还有商品。刘少奇同志也指出，只要不消灭按劳分配，商品就不能取消。

斯大林的缺点在于，没有看到象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认为全民所有制可以只有一个模式，用不着考虑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别。集体所有制也只有一个模式，而且重要生产资料（土地、农业机械）只能国有，在征购农产品的时候，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斯大林虽然承认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还是商品交换，但否

认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还起调节作用；而且认为全民所有制各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实质上已经不是商品，所以他主持制定的经济管理体制只重视计划调节，不重视市场调节。

旧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沙皇俄国更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先进地区和后进地区相差几个世纪。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更有必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科学的研究。我国只花八年时间就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去认为这是完全成功的。现在看来，在后两年前进得快了一点，而且在某些方面走过了头。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刮了一阵“共产风”，在两三年内逐步退回来了，但是直到现在片面追求大、追求公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学习苏联经验，对全民所有制采取一个模式，对集体所有制也采取一个模式，在城市中企图基本上消灭集体所有制，在农村中不准许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的经营形式，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的残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也采取了只重视计划调节，不重视市场调节，过分集中统一，与现实情况不相适应的经济管理制度。

我国广大农村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不发展商品经济，不利用市场的作用，就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因而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现在农村中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不能老在公社范围内搞建设，而要向发展城乡经济联系前进。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大部分还没有发展到垄断资本的阶段，没有发展各式各样的经济组织（如托拉斯）来扩大经济上的联合。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学习苏联经验，采取条条、块块的行政管理方法，把原来存在的一些市场经济的联系也割断了。我们把资

本主义世界在二三百年中间发展起来的适合于现代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结构一脚踢开，另外建立一套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认识，社会主义决不是少数人的头脑中想出来的，而是从现实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图跳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一下子消灭现实社会必然存在的差别性，建立清一色的“纯洁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违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容许多种经营形式同时存在，并在一定限度内容许少数其它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全民所有制不能只采取一个模式，要允许各行各业、各地区，机械化程度不同、大中小规模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经营管理方式。集体所有制更不能只采取一个模式。各经济单位的公有化程度高低不同，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可以部分地包含集体所有制的成分，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也可以部分地包含个体所有制的成分。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不同于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更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由于地区间经济条件的差别很大，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更应当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是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极少数社队企业很发达，公社和大队两级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生产队的收入的公社，已经过渡到大队所有制，个别的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这几种形式大多数是办得对的。另一方面，全国还有少数地区直到现在，生产队还没有力量保障社员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在这里除鼓励社员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外，还必须利用他们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特别是人烟稀少的深山峻岭、游牧地区，硬要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劳动，

必然降低劳动效果，造成很大的浪费，在所有制问题上应当更松动一些。判断那一种所有制最优越，主要标准应当是有利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离开了这一点来要求“一大二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我认为，在全国城市中，集体所有制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消灭集体所有制是犯了一个错误。现在城市中的“大集体”，实际上是“小全民”，除二轻局还保留一小部分利润可以自己支配（这一点使许多城市的“大集体”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国营工业）外，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劳动报酬等方面，同国营工业没有多少差别。从一九七〇年起，许多城市办了不少“小集体”，即街道企业。对它们没有完全遵守集体所有制的原则，而且往往一发展起来就被无偿剥夺，升为国营或“大集体”企业。长时期来，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在城市中集体所有制已经是过时了的东西。去年起为着解决劳动就业问题，许多城市办了不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或合作小组。但是许多人把这作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临时性的措施，是国营企业的劳动后备军。国营企业一招工，合作社的社员就纷纷去抢“铁饭碗”了。北京市是办城市集体所有制比较好的地方，但合作社员仍然把这当作“纸饭碗”。对这种集体组织能否长期存在，大家将信将疑。许多合作社是用行政方法组织起来，没有坚持自愿结合、自负盈亏、劳动分红、民主管理这些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原则。市委决定对全民企业和集体企业应该一视同仁，有些部门又执行又不执行，集体组织仍然处处低人一等。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所有制组织就很难巩固。至于不剥削别人的个体劳动者，当然就受到更大的歧视了。

在农村中，去年有些贫穷地区实行责任到组，个别地区

甚至实行责任到户或到人、联系产量进行分配的制度，增产效果十分显著。责任到户或到人不同于分田到户，土地仍归公有，生产队有统一的规划和统一的领导。有些农活如果集体劳动有利，仍然要保持集体劳动。

提高农业公有化的水平，不一定完全用扩大集体生产的办法，也可以通过供销关系把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起来。南斯拉夫个体农民仍占优势，但农工商联合企业通过供销关系，把国营农场、合作农场、个体农场组织起来，成为农工商结合的共同体，规模比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大得多，商品化、机械化、社会化程度比我们高。看来通过流通渠道来组织农业劳动者，也是一种相当好的组织形式，我国农业合作化以前也是通过供销合作社来组织农民的。当然，我国地少人多，一家十亩地是不可能机械化的，平整土地和水利灌溉也很困难，所以必须组织起来。但是，农业集体化必须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经营方式。采取任何经营方式都必须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一九七九年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这样又将出现一种新的经济成分。我们既然可以让资本主义国家来我国投资，当然更应当让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向祖国投资。一九七九年以来，这种公私合营的企业已在许多地方开始发展。最近上海工商联组织了一个爱国建设公司，已经筹集资金五六千万元，为海外侨胞建筑住宅，并向某些中小企业特别是集体经济组织贷款。天津、北京也正在组织类似的公司。我认为利用这些爱国人士的资金，特别是利用他们经营管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经验，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好处的。宪法规定，准许不剥削别人的个体劳动者继续存在。

我看在最近若干年内，这方面应当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中的饮食业、服装业、修理业以及其它服务性行业，都是手工劳动，而且宜于分散经营，最好是采取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合作小组和个体劳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相当巩固，有一点半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决不可能动摇社会主义经济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坚强领导下，以大量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助手，以小量的其它几种经济成分为补充，这可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走的道路。

## 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我国是有九亿七千多万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在全国范围内必须建立独立的、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提出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发展到企图在每个协作区甚至每个省区都要建立完整的经济体系，这就错了。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各地有各地的特点，我们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扬长避短，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分工协作，互通有无。各地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上海是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但它缺乏各种自然资源。西北、西南有许多地区工业不发达，但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两类地区必须分工合作，互相补充，把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

要进入世界市场进行竞争，也必须扬长避短，发挥我国自己的优势。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的优势是劳动力多，生活费用低，资源丰富；劣势是资金少，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